

## 戰略脫節：宋太宗第二次經略幽燕(986)

曾瑞龍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對於從事國際安全和戰略研究的學者而言，一個軍事強國的大戰略如何定向，在妥協、防禦和攻略之間如何取捨，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傳統歐陸的外交學說，喜歡以勢力平衡等現實主義觀點來解釋國與國的衝突；換言之，注重國際間權力的分配如何影響秩序的構成，這類學說被稱為結構性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可是七、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注意到不同文明、不同國家在同樣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中的戰略取向未盡雷同，而這種差異，卻可以在其國內政情和文化中找到根源。隨著近年理論的研究深入展開和個案的多樣化，更多學者相信大戰略取向由戰略文化或國內利益所決定。<sup>1</sup> 於是，有關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的研究應運而生。<sup>2</sup> 本文借用戰略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對宋太宗經略幽燕的個案試作一深入探討。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宋太宗發動第二次幽州攻略，<sup>3</sup> 結果大敗於歧溝關。攻勢

<sup>1</sup> 可參看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Stein, "Beyond Realism: The Study of Grand Strategy," in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Stein (eds.),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21及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此外，Jeffrey Legro, *Cooperation under Fire: Anglo-German Restraint during World War II*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提供了某些實例作進一步討論。

<sup>2</sup> Jack Snyder,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Caveat Emptor," in Carl G. Jacobsen (ed.), *Strategic Power USA/USSR*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90), pp. 3-9; Booth Ken,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Culture Affirmed," in Jacobsen, pp. 121-2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1.

<sup>3</sup> 對於這次軍事行動的命名，傳統以來多作「雍熙北伐」，隱含以宋為本位之意，近年學者有修正為「雍熙戰役」，或逕作「歧溝關之戰」。一般而言，會戰(battle)的命名可以完全根據地名，較容易維持不偏不倚；但戰役(operation)的命名很難避免以發動者為本位。竊意以為約定俗成，亦無不可，但「歧溝關之戰」語意太窄，和本文詳於大戰略取向而略於戰術作戰的視界難以照合，因此取李攸《宋朝事實》(臺北：西南書局，1973年)卷二十〈經略幽燕〉的篇名來命名是次戰役。

受挫的宋軍，在同年再遭受陳家谷、君子館兩次敗北。從此，經略幽燕地區的構想，要到北宋末年才重新受到注視和付諸實踐。在期間的一個多世紀中，宋朝的軍隊從主動攻略轉取守勢，而政府的對外政策也傾向保守和慎重，這都可說是歧溝關一役直接或間接的後果。關於這次戰役，前輩學者已探討過它的正義性，<sup>4</sup> 也從兵種和軍事力量討論過宋軍的失敗原因。<sup>5</sup> 更多及更強烈的批評針對宋太宗及其統治術，其中宋太宗個人的軍事才能成爲第一個焦點，<sup>6</sup> 他的軍事政策，尤其是「將從中御」和「更戍法」則幾乎受

<sup>4</sup> 這個問題有兩個層次：首先，宋人要收復幽燕，理據是否充分？其次，使用武力解決領土糾紛是否適當？民初以來的學者大都站在民族主義立場，認爲北宋收復幽燕是正義之師，只有少數學者認爲宋太宗窮兵黷武。近二十年來部分學者站在和平國際秩序的立場出發，譴責宋太宗採取武力解決國際糾紛。參見顧全芳：〈評宋初的對遼政策〉，《社會科學輯刊》1985年第5期，頁56-62；徐紅年：〈論遼宋戰爭的性質〉，《北京社會科學》1991年第1期，頁109-13。當然，在十世紀中國，以外交途徑來解決衝突並不像今天的國際社會那樣具有規範意義，而歷史上很多所謂正義戰爭並不一定符合其嚴格的定義。關於正義戰爭的含義及有關討論，可參考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 (Harmondworth: Penguin, 1980)。不過，由於宋太祖曾提供了一個觸目的另類方案，打算以銀絹贖回幽燕故土，宋太宗便相對上顯得欲速而不達。

<sup>5</sup> 普遍意見認爲遼強宋弱，步不敵騎，參見金毓黻：《宋遼金史》（臺北：樂天出版社，1972年），頁31-32；姚從吾（著）、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姚從吾先生全集》第二分冊《遼金元史講義——甲·遼朝史》（臺北：正中書局，1972年），頁187-88；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63-68；尹承琳、許曉秋：〈蕭綽評述〉，載陳述（編）：《遼金史論集》第二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頁52-68。只有部分文章提出宋軍的實力未必薄弱，如汪槐齡：〈論宋太宗〉，《學術月刊》1986年第3期，頁61-68。也有些學者強調當時遼國內部安定，君臣將帥的才幹較高，如楊樹森：〈略論遼代軍事家耶律休哥：兼說宋兩次攻遼戰爭之敗〉，載陳述（編）：《遼金史論集》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99-110；陳烈：〈遼代部族軍考〉，《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社版）1992年第1期，頁11-17；及杜成安：〈評宋太宗雍熙北伐的戰略意圖〉，《撫順師專學報》（社科版）1992年第2期，頁51-56。

<sup>6</sup> 在很多學者筆下，宋太宗的軍事才能遠不如其兄，由於他取得帝位的合法性很有疑問，於是企圖以完成統一大業、建立不世之功來提高威望，但又一再指揮失當而盡覆三軍。參張其凡：〈從高粱河之敗到雍熙北征〉，原載《華南師大學報》1983年第3期，收入張其凡：《宋初 政治探研》（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31-47及新近出版的《宋太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頁149-51；唐兆梅：〈讀《評北宋雍熙北伐》以後〉，《中州學刊》1986年第1期，頁106-8；毛元祐：〈北宋太宗的性格特徵及其影響〉，《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5期，頁75-80。此外純粹考證「金匱之盟」、「斧影燭聲」及宋太宗篡位說的論文甚多，因與本文無重大關涉，不再一一注出。至於雍熙北伐的作戰計劃貌似頭頭是道，學者大多認爲也不過是紙上談兵的「傑作」而已。參王煦華、金永高：〈宋遼和戰關係中的幾個問題〉，《文史》第九輯（1980年6月），頁83-113；另收入歷史研究編輯部（編）：《遼金史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77-83；王曾瑜：《宋朝

到全方位的抨擊。<sup>7</sup> 也有一些學者從戰略角度分析，但也主要集中在戰役層次，對大戰略決策的分析幾乎欠奉。<sup>8</sup>

北宋初年的大戰略取向是甚麼？從澶淵之盟、增幣交涉和慶曆和議等一系列和議看來，說宋代的對外政策走的是一條妥協的道路，大概沒有甚麼異議。可是從更廣闊的空

〔上接頁2〕

兵制初探》，頁327-30；張其凡：〈從高梁河之敗到雍熙北征〉；顧全芳：〈評北宋雍熙北伐〉，《中州學刊》1984年第2期，筆者未見此文。據唐兆梅前引評介，顧氏也持這個論點。汪槐齡：〈論宋太宗〉，《學術月刊》1986年第3期，頁61-68。據史書記載，開國功臣趙普又批評他聽信「小人」之言。近年學者中較強調這一點的有漆俠：〈宋太宗雍熙北伐〉，《河北學刊》1992年第2期，頁79-87。何冠環〈宋太宗箭疾新考〉一文則進而指出宋太宗自己也成為自大狂的犧牲品，他曾高梁河戰役身受箭傷，多年後傷口惡化而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0卷，1989年，頁33-58）。

<sup>7</sup> 宋太宗所重用的都是「謹厚」的人。這種人中當然也有能征慣戰者，但更多是從監軍、虞候出身，忠謹有餘而指揮能力方面往往差強人意。他們又排擠久歷沙場的猛將，令後者不能發揮作用。林瑞翰：〈宋太祖太宗之御將及太宗之治術〉，《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5期，頁53-71；毛元佑：〈宋太宗的性格特徵及其影響〉，頁77-78；及〈宋初文武朝臣處世態度之心理分析〉，《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1期，頁72-83；張其凡：〈從高梁河之敗到雍熙北征〉，頁142-43；漆俠：〈宋太宗雍熙北伐〉，頁85；何冠環：〈論宋太祖朝武將之黨爭〉，《中國史學》第五卷（1995年10月），頁45-62；及〈論宋太宗朝武將之黨爭〉，《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4期（1995年），頁173-202；王菡：《潘美傳》（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5年），頁90-123。另外，宋太宗企圖以事前制訂的方略、陣圖來取代親身指揮，也造成指揮系統上一些不必要的失誤。他為滿城會戰制訂的陣圖，令兵力布勢過分零散，不符合現場的情況需要，幸賴諸將當機立斷，變陣出擊，才獲得大勝，可見以「遙制」的方式來指揮戰術作業根本是行不通的。參吳晗：〈陣圖與宋遼戰爭〉，《新建設》1959年第4期；另收入《吳晗史學論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三分冊，頁87-96；又漆俠：〈宋太宗雍熙北伐〉，頁85。王瑞明《宋代政治史概要》作了一點修正，說「陣圖並非神聖不可違背」（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總言之，在學者筆下，宋太宗並非典型的昏君，他確有許多成就，但他對軍事機制橫加的種種系統化管理和防制措施，突顯了他專制君主形象。由於歧溝關的慘敗是宋太宗過度中央集權、猜忌武臣等種種措施種下的苦果，難怪在史家描述宋太宗收復經略幽燕之失敗，有時會帶有諷刺的筆調，如張蔭麟：〈北宋的外患與變法〉，原載《思想與時代》第5期（1941年），收入周康燮（編）：《宋遼金元史論集》（香港：存粹學社，1971年），頁11-22。

<sup>8</sup> 廖隆盛〈宋太宗的聯夷攻遼外交及其二次北伐〉為僅見從國際形勢分析的論文（《師大歷史學報》第10期，1982年，頁83-103）。杜成安〈評宋太宗雍熙北伐的戰略意圖〉一文則從戰役法角度批評，頗見嚴厲。有少數學者對宋太宗的軍事造詣和他擬定的北伐作戰計劃保留肯定的態度，如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對此役經過有詳細考論，稱宋太宗的戰略採外綫作戰的姿態，曹彬等不能奉行，以致兵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頁95-136）；王菡：《潘美傳》，頁102-11；林宇：〈遼宋雍熙戰役〉，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北京文物與考古》第二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頁130-39。

間來討論，則很多派生及外緣的問題好像還沒有定論，例如宋代的對外妥協政策有沒有延續性？有的話，它的主導思想是甚麼？是弭兵論？現實主義？還是統治者勉強壓下「忠臣義士」一腔熱血的一己私心？又或者問：宋太宗兩次經略幽州、宋神宗綏州之役（1067）、徽宗「收復燕雲」之役，以至南宋「開禧北伐」、「端平入洛」等等好像突然發生的戰爭，而且都屬於攻勢作戰，如何理解？是和平大氣候中的暗湧？還是一貫以來收復疆土運動擺脫了弭兵論的桎梏？傳統以來將君子、小人或主和、主戰兩派之爭來解釋固然不很令人滿意，但捨此之外，又怎樣理解如此極端反覆的行為？莊士東(Alaister Johnston)以明代為例，指出傳統中國的大戰略取向是攻略為核心的文化現實主義(cultural realism)，而妥協和防禦是力量不足時的權宜之計，那麼宋代又如何？總之，一般認為宋代對外政策較為保守，但卻同樣出現積極的對外攻略，如何從大戰略研究角度予以解釋，目前還很欠缺。這些問題固然不可能在短短一篇文章得到解答，本文只就雍熙北伐一個例子提出解釋，其中心問題是：經過高粱河一役(979)的挫敗，宋太宗在太平興國七年(982)下弭兵之詔，大唱老子「佳兵不祥」的高調，似乎弭兵論已得到最高決策的認同；<sup>9</sup> 然而雍熙三年(986)他忽然大舉北伐，何以在七年之間政策如此搖擺不定？雍熙北伐前夕北宋朝廷的大戰略取向是甚麼？而這個取向的合理化是怎樣完成的？

本文將宋太宗第二次經略幽燕作為大戰略研究的素材，除上述的核心問題外，還基於兩個原因：首先，宋遼軍事對峙的形勢在980年代初年已逐步形成，宋軍第二次經略幽燕的決策是在有限的實力和資源底下作出。如果以傳統結構性現實主義的角度，以國際勢力平衡觀點來看，宋軍並沒有戰略優勢，不適宜發動軍事冒險，而應維持太平興國七年(982)以來嚴兵守境、製造講和機會的政策。因此，宋太宗第二次經略幽燕的決策可能含有非理性成分，而這種非理性成分，並非純粹為報高粱河一箭之仇或誤信小人之言那樣簡單。此外，對於應否主動進攻，宋初文武臣僚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意見，立場比較清晰；加上史書對這次作戰的意圖和謀略有所披露，作戰日程在宋、遼二史和《續資治通鑑長編》中都有較詳盡的紀錄。因此，這是比較適宜作為戰略研究的歷史個案。

對於上述三方面問題的討論構成了本文三個章節。「大戰略分析」一節首先分析北宋大戰略取向的內在矛盾，及其導致國際行為從追求弭兵到轉取強大攻勢收復疆土的

<sup>9</sup> 宋初頗具影響力的弭兵論為何沒有能制約戰爭的再起，學者也有不同解釋，有視之為一種「小帝國」的文飾之辭，有視之為軍事失敗後的主和主守論，也有學者指出弭兵論含有慎重緩圖之計，並非純粹反戰。以上三個論點，依次見Wang Gungwu(王賡武)，“The Rhetoric of a Lesser Empire: Early Sung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in Morris Rossabi (ed.),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14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47-65；陳芳明：〈宋初弭兵論的檢討，960-1004〉，載《宋史研究集》第九輯(1977年)，頁63-98；及王明蓀：〈宋初的反戰論〉，載鄧廣銘、漆俠(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478-89。

劇烈反覆。繼而，「戰略形勢」一節從討論北伐發生前的戰略形勢。最後「作戰計劃」一節是對於宋太宗作戰計劃的評估。學者對作戰計劃的興趣比較濃厚，這裏試圖以戰役法(operational art)觀點予以釐清及評價。此外有兩個枝節問題：一個是應怎樣評價剛卸任的宰相宋琪曾提出的另一個作戰計劃；另一個是曹彬有沒有「不遵成算」，而失敗「責在主將」的問題。<sup>10</sup> 對於前者涉及較複雜的年代斷限問題，擬另撰專文考證，下文僅對該作戰計劃的內容作一簡要討論。至於後者，則完全屬於戰役運作範疇，與本文論旨無涉。

## 大戰略取向

北宋建國後面臨兩個重大的戰略任務：從短綫而言，是帝國的重新統一，其中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收回五代割給遼國的盧龍、振武地區，即北宋末年所謂「燕雲」地區；從長綫而言，是弭兵息戰，<sup>11</sup> 建立穩固統治。在這兩個戰略目標背後存在兩個意識形態：

<sup>10</sup> 學界對於曹彬是庸將這一點沒有甚麼異議，參見王夫之：《宋論》（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頁35-36；張其凡：〈庸將負盛名——略論曹彬〉，載鄧廣銘、徐規等（編）：《宋史研究論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507-27；柳立言：〈宋初一個武將家族的興起——真定曹氏〉，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編）：《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頁40-50。王煦華、金永高〈宋遼和戰關係中的幾個問題〉一文認為曹彬不敢「不遵成算」，但他棄軍先遁，直接導致大軍瓦解，也負有重大責任（頁247）。

<sup>11</sup> 人類抵制暴力有四種態度：（一）合法自衛；（二）將暴力的使用規範化；（三）以非暴力規範取代暴力；（四）排斥一切暴力。第一種態度是人類對暴力最原始的反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可是對於國際行爲，誰先進行挑釁，往往不容易作出公正的判決，軍事行動的自衛性與攻擊性也不容易劃分。哪些是可以接受的抗暴行爲，需要較為清晰的規範。第二種態度傾向將暴力融入形形色色的規範中，企圖以符合信仰、道德或法紀的暴力來壓倒濫用暴力者——「十字軍」、「聖戰」(jihad)、「義戰」(just war)、「有道討無道」的概念都由此而生。各式各樣的規範固然限制了暴力的使用，但也同時保障了暴力的使用。第三種態度即試圖以非暴力規範取代暴力，在一定條件和共識下達成互不侵犯，開放貿易，互通有無，有衝突時以外交談判和斡旋的方式解決等等。在一般用語中，這種講究非暴力規範的學說也被稱爲弭兵論。規範確乎減低了暴力的使用，可是能否杜絕威懾、圍堵、軍備競賽等種種廣義的、蓄而未發的暴力，仍需要進一步觀察和研究。還有第四種態度，亦即嚴格意義上的弭兵論，持論者看透了暴力的本質不過在破壞現存的事物和置人於死地，但設若人的價值並非建立在短短數十年光陰，而是一種更高尚的情操、更廣泛的生命，那時生死、榮辱、成敗、得失都不足較，自然不會在暴力之下屈服，也不會以暴易暴。弭兵論固然可以純粹立足於人道主義，但常常和宗教掛鉤，因爲信仰提供了一個世俗以外的價值立場。佛祖先世捨身飼虎，是覺得塵世生命不足惜；耶穌說「愛你的敵人」，是歸結於上帝與凱撒各自有不同的國度。暴徒在凡塵肆虐，卻難逃最後審判。宋代的弭兵論代表第三種態度居多，很少採取嚴格的立場。

一個是統一王朝的觀念，另一個是「致太平」的願望。這兩個戰略任務的先後次序及其背後兩種意識形態的關係，交織出宋初複雜而微妙的對外關係。這兩個戰略目標並不互相排斥——前者指向和平，後者也不一定主張戰爭。縱使萬一需要使用武力，也可以看作為達致和平鋪路的不可避免的手段。深入一點說，這兩個目標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端視我們怎樣去理解「戰爭」與「和平」兩個概念。從絕對的意義上看，「戰爭」與「和平」是二律背反，同一時空之中發生戰爭，和平即蕩然無存。但在我們日常的使用中，「和平」並非單純作為乾巴巴的技術性字眼——即「沒有戰爭」，或「並非處於戰爭狀態」的意思。它經常含有意願成分，「保衛和平」、「促進世界和平」等用語透露出人生於世的一種理想和規範。<sup>12</sup>可是「和平」一旦含有主觀意願的成分，它和戰爭的關係就複雜起來，而不單單作為它的反面了。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其目的也是在現狀作出了相當有利的改變後，回到和平狀況中去。換言之，戰爭雖然破壞了和平，但也可以帶來符合戰爭發動者意願的「和平」——戰爭可以作為和平的手段。古羅馬的諺語「假使你希望和平，就應準備戰爭」，這句話已有些過時了，<sup>13</sup>但我們仍可以從中體味到「戰爭」與「和平」的辯證關係。回到「弭兵」與「經略幽燕」的關係，也可以這樣來理解，兩者具有不同的指向，但在實力充裕的理想狀況下，完成統一可以作為達成弭兵息戰的重要步驟。

弭兵息戰，建立穩固統治作為宋初的一個戰略任務，前輩學者已經作過不少探究，尤以對於建立穩固統治方面成績突出，其中關於「收兵權」和「強幹弱枝」政策的研究最為深入。然而弭兵息戰作為戰略任務，與中央集權等措施密不可分。五代時中央政府的軍力其實早已凌駕諸鎮，<sup>14</sup>但還是叛亂頻生，正由於長期戰亂持續地為野心軍人製造攫取政權的機會。停止戰爭成為了安定內部的一個重要條件。趙匡胤登位未久，便和趙普商量：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sup>15</sup>

<sup>12</sup> Ronald Glossop, J., *Confronting War: An Examination of Humanity's Most Pressing Problem* (Jefferson, NC and London: McFarland, 1987), pp. 10-12.

<sup>13</sup>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李德哈特(Liddell Hart)曾將這句話修正為：「假使你希望和平，就應了解戰爭。」見李德哈特(著)、鈕先鍾(譯)：《為何不向歷史學習？》(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臺北：軍事譯粹社，1977年初版，1981年再版)，頁80。

<sup>14</sup> 聶崇岐：〈論宋太祖收兵權〉，原載《燕京學報》第34期，收入聶崇岐：《宋史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263-82；Wang Gungwu,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3)。

<sup>15</sup> 司馬光(撰)、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一，頁11；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以下簡稱《長編》)，卷二，頁49略同。

過往史家經常徵引這條史料，通常都是作為北宋推行「強幹弱枝」政策的證據來運用的，很少談及弭兵息戰的方面。觀乎宋太祖說「吾欲息天下之兵」一句，可以看出弭兵息戰是作為一個戰略目標而提出來；而趙普的「收兵權，罷藩鎮」政策，則作為達成這項目標的手段而加以闡述，所以我們在討論宋代「國策」時沒有理由忽略弭兵息戰這項宋初君臣苦心孤詣追求的目標。

所有戰略的目的都是為了帶來合乎當事者意願或至少維持可接受的和平，那麼當時出現的弭兵論又有甚麼特殊意義呢？到底其本質是甚麼？是屬於建立和平共存規範的呼聲，力不從心的迂闊之論，還是暗地裏準備打仗的迷人煙幕？

無可否認弭兵論具有文飾軍事挫敗的作用。太平興國五年瓦橋關之役，宋兵受挫，宋太宗準備大起禁旅進攻幽州，翰林學士李昉即上奏勸止，說宋軍若「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固足懼彼殘妖，亦恐勞於大舉」。<sup>16</sup> 他刻意迴避軍事實力不足的問題，而以冠冕堂皇的說話自解。宋太宗晚年自稱「朕往歲既克并、汾，觀兵幽薊，方年少氣銳，至桑乾河，絕流而過，不由橋樑。往則奮銳居先，還乃勒騎殿後，靜而思之，亦可為戒」。<sup>17</sup> 由於過於誇大自己的英武形象，反而顯得欲蓋彌彰。宋太宗第一次進攻幽州時經常上前綫指揮，史有明文，形容當時「奮銳居先」大概沒有很大問題。可是近年的研究指出，高粱河一戰中他很可能身受箭傷，乘夜退出戰場，連能否乘馬也有問題，<sup>18</sup> 文飾敗陣的動機顯而易見。

可是要說弭兵論純粹是軍事失敗的事後掩飾，同樣欠妥。前引宋太祖和趙普的對話發生在宋遼戰爭之前，還沒有人知道戰爭的結果，怎可能想到以虛言弭兵來掩蓋失敗的事實？弭兵具有現實的迫切性，從晚唐五代的兵禍中可以得到印證。戰亂將戰士與受害者劃分為兩個極端的世界。亂世出英雄，在這個動蕩的時代裏留下大量戰鬥英雄的傳說，一部分融進了「十三太保」系列的故事，其餘的散為支流。從歐陽修〈王彥章畫像記〉，可以窺見某些英雄在百多年後仍受擁戴；<sup>19</sup> 至於周德威單挑單廷珪的事迹，則被吸收到《水滸傳》中去。<sup>20</sup> 可是在動人事迹的背後，人民卻遭受駭人聽聞的

<sup>16</sup> 《長編》，卷二十一，頁483。

<sup>17</sup> 同上注，卷三十四，頁758-59。

<sup>18</sup> 何冠環：〈宋太宗箭疾新考〉；曾瑞龍：〈宋遼高粱河戰役考論〉，《大陸雜誌》第80卷第3期(1990年)，頁106-17。

<sup>19</sup> 歐陽修：〈王彥章畫像記〉，收入《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6年)，卷三十九，頁272-73。

<sup>20</sup> 《水滸傳》的時代背景本來設在北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間，但梁山一百零八人中有「聖水將軍」單廷珪，與五代幽州名將單廷珪姓名相同，被「大刀」關勝單挑擒獲的情節，亦與正史中為周德威所擒一節相類，其承襲關係，可比較而意會。參見薛居正：《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五十六〈周德威傳〉，頁752-53；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十五〈周德威傳〉，頁262；施耐庵：《水滸》，七十一回本(香港：中華書局，1970年)，第六十七回〈宋江賞馬步三軍，關勝降水火二將〉，頁786-87。

虐殺。<sup>21</sup> 別的不說，單從人吃人的慘況，已能窺見戰亂的禍害。秦宗權的軍隊中公然設立「磨樁寨」，有計劃、有秩序地將人屠宰，充當軍糧。<sup>22</sup> 歷時逾年的鳳翔之圍（901），令城中人燒屎煮屍而食，人肉一百文錢一斤，狗肉五百文錢一斤，可見人肉之賤。有人吃掉自己的兒子，還竟然對要來爭肉吃的人說：「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sup>23</sup> 李存孝向梁軍叫陣，大呼：「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門！」據史書記載，當時應聲出門，並遭生擒的敵將鄧季筠幸得李克用賞識，沒有被吃掉，<sup>24</sup> 可是這番話在後世稱為「十三太保」的李存孝口中說出，卻鮮明地突顯出一個活地獄——勝利者成為眾人愛戴的英雄，戰敗者則和無辜平民一樣變成犧牲品。

敦煌發現的一件文書（P.3633V1）上有〈龍泉神劍歌〉和〈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上回鶻天可汗書〉兩個文件。由於兩份文件是寫在同一寫本的正反兩面，恰好構成同樣鮮明的對照。在〈龍泉神劍歌〉中，我們看到敦煌金山國統治者是如何地野心勃勃，企圖以「蕃漢精兵一萬強，打卻甘州坐五涼」，而結果只落得哀鴻遍野。敦煌百姓唯有向甘州回鶻可汗乞和，請求「莫煞無辜百姓」。書末以「沙州百姓一萬人」結狀。<sup>25</sup> 史書中帝王向外敵求和時，號稱為了人民利益而「屈一己之身」的例子很多，但由人民出面要求和平的文件卻很少見，值得重視和進一步探討。

在這樣「兵革不息，蒼生塗地」的背景下，也產生對歷史的反思。尤其是唐代的歷史教訓，經常令宋初學者深刻檢討。田錫認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是舍近而圖遠矣。」<sup>26</sup> 呂蒙正也有類似的評論，說：「前代征遼，人不堪命。隋煬帝全軍陷沒，唐太宗躬率群臣運土填塹，身先士卒，終無所濟。」<sup>27</sup> 換言之，他們覺得唐代的歷史錯誤需要修正。後世人從澶淵之盟、靖康之難的發生和總結認為北宋對外政策太消極被動，對宋初文臣學者的弭兵之說自然不予苟同，說：「〔張〕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齊賢徒知契丹未可伐，而不知幽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不之知，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sup>28</sup>

五代末年已有一些讀書人渴望文治政府的出現。史書記載，在太平興國二年登第的許驥，其父親本屬商人，偶然看見新及第的進士魚貫而出，心裏有所感觸，便放棄經

<sup>21</sup> 王伊同：〈五季兵禍輯錄〉，《史學年報》第2卷第3期（1936），頁203-5。

<sup>22</sup> 《新五代史》卷四十二〈趙犛傳〉，頁461。

<sup>23</sup> 同上注，卷四十，頁431-32。

<sup>24</sup> 同上注，卷三十六，頁392；關於鄧季筠之餘生，見《舊五代史》卷十九〈鄧季筠傳〉，頁262-63。

<sup>25</sup>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18-27。

<sup>26</sup> 《長編》，卷二十二，頁499。

<sup>27</sup> 同上注，卷三十四，頁758；《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呂蒙正傳〉，頁9147略同。

<sup>28</sup> 《長編》，卷二十一，頁485。



商，專心供許驥讀書。<sup>29</sup> 宋初大臣賈黃中的父親，也是自幼規定他每日讀和身高一樣尺寸的書卷，「謂之等身書」，又「常令蔬食」，說「俟業成，乃得食肉」。<sup>30</sup> 這兩位父親預期著文治政府的重建和開科取士，反映當時所謂「亂久思治」的心理。最後，連宋太宗也承認「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以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鑑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需以文德致治」。<sup>31</sup> 弭兵息戰成爲文官政府的基本取向。

部分主張弭兵的文臣、學者還開始從國際規範的意義來思考。<sup>32</sup> 張齊賢發現契丹也面對著和宋人一樣沈重的邊糧負擔，他說：「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尙眾，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新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因此他認爲契丹並非天生好戰，「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於敵國，率由邊吏擾以致之。……且臣料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患哉！」<sup>33</sup> 雍熙四年(987)趙孚按照這個思路，進一步倡言「臣又料敵人去危就安之情，厭勞就逸之意，畏死貪生之性，好利懼害之心，亦與華人不殊也」。<sup>34</sup> 從雙方都面臨共通的困難，分享共同的人性，未始不能再進一步建立起和平的國際規範。到太平興國七年(982)，宋太宗進行了初步的嘗試，史臣記載：

癸丑，詔緣邊諸州軍縣鎮等，各務守境力田，無得闌出邊關，侵擾帳族，及奪略畜產。所在嚴加偵邏，違者重論其罪，獲羊馬生口並送塞外。<sup>35</sup>

可是在這裏，出現一個東西方弭兵論都遇到的普遍問題：當弭兵論一旦走出純粹意識形態層面，而要具體地落實爲國際行爲的規範，它就無可避免地接觸到戰略的現實。任何戰略目標都必須面對敵對勢力的破壞，當和平成爲戰略的組成部分時，也面對相同

<sup>29</sup> 《宋史》卷二百七十七〈許驥傳〉，頁9435。

<sup>30</sup> 同上注，卷二百六十五〈賈黃中傳〉，頁9160。

<sup>31</sup> 《長編》，卷二十三，頁528。

<sup>32</sup> 社會學家相信規範(norm)在人類活動中無所不在，道德、法律、風俗、習慣、往例等等都屬於規範。其中國際關係主要牽涉到的是建構性的規範(constitutive norms)和具備約束力的規範(regulative norms)。前者基於歷史背景和文化接觸而形成一些共有的假設，並預期對方作出相稱的回應，長此以往，便形成外交慣例。「和親」便是將同一家人必須和睦相處的規範，放大投射到國際關係的例子。可是這種規範並沒有約束力。相反，法律便屬於具備約束力的規範，一旦違反會招來制裁。宋初的弭兵論觸及的主要是建構性的規範，尋求主動的偃武修文來換取對方諒解，而最終達成互不侵犯；宋遼之間具有約束力的規範，如互相不得增築城寨、開掘河道等條例要到澶淵之盟才正式訂立。

<sup>33</sup> 《長編》，卷二十一，頁484；《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張齊賢傳〉，頁9151略同。

<sup>34</sup> 《長編》，卷二十八，頁635；《宋史》卷二百八十七〈趙孚傳〉，頁9656略同。

<sup>35</sup> 《長編》，卷二十三，頁528。

的命運。那時文化深層能否為非暴力提供理論基礎，就極關重要。儒家思想本身是統治階層的理據，和政治現實密切掛鉤，儒家禮制中以兵為刑的思想，追求的是合乎道義規範地使用武力，力圖將暴力的破壞控制在有限的範圍，而使用武力的權力也掌握在有道德的統治者手裏，故也不必徹底反對，<sup>36</sup> 沒有發展為佛祖本生捨身飼虎，或耶穌愛敵如友的地步。<sup>37</sup> 同樣，講求「非攻」的墨子認為自衛合乎道義，沒有徹底反對一切暴力。道家的弭兵論也欠徹底，老子曾批評統治者好戰便是喜歡殺人，有點人道主義的訊息；但他跟著又說喜歡殺人者不能得天下，那樣仍然是離不開從政治效益立論。<sup>38</sup>

北宋雍熙以前的弭兵論者，誠然看到民生困苦，但沒有怎樣從理論上反對暴力。李昉勸宋太宗不要急於進攻幽州，理由是民生困弊。「且河朔之區，連歲飛挽，近經蹂躪，尤極蕭然」，可是他在奏章末處又說：「伏望申戒羽衛，旋師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儲軍糧，講習武經，繕修攻具。俟府藏之充溢，泊閭里之完富，晷歲之間，用師未晚。」<sup>39</sup> 李昉的立場很清楚，他並不反對使用武力，只是認為應該等到實力充足，有足夠把握取勝時才使用，根本不能算是弭兵論。李至提出一些軍事上的難題，除兵力糧道等外，連「去山既遠，取石尤難，……則發機縋石，將安得乎」的戰術問題都考慮到了，也不算嚴格的弭兵論。他所強調的其實是皇帝的安全：

<sup>36</sup> 儒家「六藝」中本含有射御等軍事技術，孔子雖然提到「去兵」，但那是作為一個迫不得已的困難選擇來討論的，並不是從原則上反對暴力。

<sup>37</sup> 當然，由於戰爭成為政治的機制，即使在西方，純粹反對暴力的意識形態只好在民間流傳。可是徹底反對暴力的言論由於陳義過高，容易與政治現實脫節，當教會成為政治力量的時候便出現「十字軍」，同樣未能達致弭兵息戰。到現代出現威力強大的核武，「義戰」的概念才面臨遭受揚棄的命運。基督教文化對弭兵的不同觀點，參見Stanley Hauerwas, "Pacifism: Som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in Malham M. Wakin (ed.), *War, Morality and the Military Profession* (Boulder and London: Westview Press, second edition, 1986), pp. 277-83; John Yoder, *Nevertheless: A Meditation on the Varieties and Shortcomings of Religious Pacifism* (Scottsdale, PA: Herald Press, 1971), pp. 21-31; US Catholic Bishops, "The Just War and Non-Violence Position," in Wakin, pp. 239-54。

<sup>38</sup> 墨子學說的局限性，在於「攻」和「守」雖然在主觀意圖上有分別，但客觀上很難建立有效的標準來分清，以它作為國際行為的道德規範時仍有模糊不清之弊。比如說古代戰士的盾和甲冑，和現代坦克、戰艦上的裝甲，就很難判斷屬於攻擊性還是防禦性用途。單從純粹技術的層面看，這些武器的直接用途是防禦性的。然而從戰術上看，大凡保護攻擊部隊，使其得以持續進行攻擊任務的設施和裝備，都可以劃歸為攻擊武器。現代戰略中的「非挑釁性防禦」(non-provocative defense)學說便企圖建立一種不帶有攻擊性的純粹防禦，詳見D. Paul (ed.), *Defending Europe: Options for Security*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5)。由於此說仍未有定論，宋代更不可能有非常嚴謹的純粹防禦觀念。

<sup>39</sup> 《長編》，卷二十一，頁483；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以下簡稱《宋會要》)，蕃夷一，頁7676略同。

若聖心獨斷，睿慮已成，則京師天下根本，願陛下不離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閑暇，慰億兆之瞻仰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張兵勢，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戎援之虞，南有中原為慮……臣雖不肖，恥在諸賢之後也。<sup>40</sup>

張齊賢和趙普的弭兵論比較嚴格一些。張齊賢提到：

契丹不足吞，幽薊不足取，……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sup>41</sup>

連強弱、疆土都不足爭，而且在宋太祖極力強調的「疆土」、「人民」兩大戰略利益之間，他也分出主次、本末，可以算是較為深入的討論。張齊賢不像李昉那樣態度含糊，但他在史書所引述的奏章中，沒有很具體地說明達致和平的方法。趙普以比較嚴峻的語氣說「鄧州五縣，其四在山，三分居民，二皆客戶。昨來差配，約共出十萬貫錢，乃可運二萬碩糧至莫州。典桑賣牛，十聞六七，亦有鬻男女，棄性命者，……如或再行徭役，決定廣致逃移」。<sup>42</sup>

恐怕陷入長期消耗戰，損耗國力，是宋初文臣主和的重要觀點。《長編》記載：「上初以契丹渝盟來援太原，遂親征范陽，欲收中國舊地。既而兵連不解，議者多請息民。」<sup>43</sup> 這段史料中的議者不知是誰，卻表出了休兵息作為文臣中相當普遍的意向，正是國家陷入長期戰爭所導致。李昉憂慮「雖偶薦於豐壤，恐不堪其調發」。<sup>44</sup> 趙普按著同一思路提出著名的論斷：

百萬家之生聚，飛挽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就其得少之中，猶難入手，況是失多之外，別有關心。<sup>45</sup>

值得留意的是這項論斷也是從權衡得失的角度，認為戰爭對國家不利來立論的。同樣，田錫說：「國家圖燕以來，兵連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sup>46</sup> 及呂蒙正

<sup>40</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02-3；《宋史》卷二百六十六〈李至傳〉，頁9176略同。

<sup>41</sup> 《長編》，卷二十一，頁484-85；《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張齊賢傳〉，頁9150略同。

<sup>42</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15；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六，頁51略同。

<sup>43</sup> 《長編》，卷二十三，頁528。

<sup>44</sup> 同上注，卷二十一，頁483。

<sup>45</sup> 同上注，卷二十七，頁614；《邵氏聞見錄》，卷六，頁49略同。

<sup>46</sup> 《長編》，卷二十二，頁499。

認為「兵者傷人匱財，不可屢動」，<sup>47</sup> 也是採取這個觀點——不是從原則上反對武力，而是從利害關係來考慮的。總之，弭兵論在意識形態上有欠澈底，極其量只能說是愛民和厭戰的思想，而不能說是反戰的思想。

和弭兵論不同，統一和經略幽燕的意識形態立場比較清晰，最終成為宋太宗雍熙三年的戰略取向。在宋初統治者眼中，收復幽燕對於作為一個統一的「中國」的認同具有很大重要性，沒有幽燕不能算是統一。宋太祖晚年拒絕君臣所上尊號，由於其中含有「一統」二字，說「幽燕未定，何謂一統？」<sup>48</sup> 前引《長編》的記載也說宋太宗「遂親征范陽，欲收中國舊地」。「朕受天景命，奄宅中區，以四海為家，兆民如子，冀咸登於富壽，豈務勝於甲兵？」<sup>49</sup> 詔文排除了窮兵黷武之嫌，似乎意圖避免讓弭兵論者拿來做攻擊的藉口。雍熙二年，宋太宗促請與高麗聯軍：「幽薊之地，本被皇風，曩以晉漢多虞，契丹因而盜據，《詩》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國家照臨所及，書軌大同，豈使齊民陷在朔漠？」<sup>50</sup> 詔文辭氣越發強硬，不但說契丹「盜據」幽燕，甚至提出「我疆我理」，完全否定了契丹管治幽燕的合法理據。

那麼宋人要用武力收回領土是否合乎當時的國際規範？盧龍、振武在五代時已割給遼國，後來周世宗又攻取瀛、莫二州，三關之地，那麼到了宋初，幽燕和關南的領土糾紛已成為了歷史懸案。既然雙方都認為喪失了領土，而中原政權亦已數度易手，那麼維持現有疆界，似乎會成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條件。事實上，宋太祖時遼將耶律琮通書講和，兩國曾訂立盟約。<sup>51</sup> 對於以上史實，近年學界大致上沒有異議。可是，由於宋太祖與遼的和約沒有包括解決北漢問題的條款在內，而太原和遼國也早就締結同盟，宋人的統一大業遲早會碰到與契丹發生軍事衝突的機會。事實上太祖開寶二年(969)圍攻太原，契丹就發兵來救。<sup>52</sup> 如果宋人堅持統一，契丹也必須在北漢與宋之間作出抉擇。因此，宋遼第一次和平內裏仍潛在危機。

到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消滅北漢前，已正式透過遼使照會，而遼景宗仍發兵來救，發生石嶺關戰役，繼而宋軍索性圍攻幽州，發生高粱河戰役，兩國已處於戰爭狀

<sup>47</sup> 同上注，卷三十四，頁759。

<sup>48</sup> 《涑水記聞》，卷一，頁6。

<sup>49</sup> 《宋朝事實》，卷二十，頁320。

<sup>50</sup> 同上注，頁321-22；宋敏求(編?)：《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二百三十七〈北伐遣使諭高麗詔〉，頁924「虜」作「虞」字，以下至「詩曰」有脫文，「朔漠」二字作「強敵」。

<sup>51</sup> 約文見《宋朝事實》，卷二十，頁317及《宋會要》文蕃夷一，頁7673；《長編》，卷十五，頁328，330略同。郭奇〈耶律琮神道碑〉對耶律琮安定幽燕地區的統治推崇備至，固有溢美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遼人的心態(向南：《遼代石刻文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56-59)。

<sup>52</sup> 《長編》，卷十，頁220-22；《遼史》卷八〈景宗紀上〉，頁95-96；卷九〈景宗紀下〉，頁99。

態。遼景宗死後，兩國事實上停戰了三數年，但並未正式訂立和約。換言之，兩國仍是處於戰爭狀態。從太宗答趙普〈諫雍熙北伐疏〉自稱「將救焚而拯溺，匪黷武以佳兵」，<sup>53</sup> 經略幽燕的理據反映在宋太宗的詔諭中，「況與契丹本通鄰好，昨以河東劉繼元不遵朝化，盜據一方，念彼遺民，行茲薄伐，素非瀆武，惟切弔民，而契丹轉舉干戈，輒來救援。一鼓既平於晉壘，六師遂指於燕郊，靡辭六月之征，聊報東門之役」。<sup>54</sup> 詔文固然擺出天朝大國的姿態，可是最後兩句也同時緊扣著一點——由於遼人武力干預宋與北漢的戰爭，它們自然成為宋軍使用武力的對象。1042年遼使重提舊事，詰問高粱河之戰的責任問題，指宋人出師無名，宋方根據王拱宸解答，遣富弼攜國書使遼解釋說：「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繫乎異代，安及本朝？……況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sup>55</sup> 可見宋人極力說明，以武力攻略幽燕並沒有違反當時國際行為的規範。

收回燕薊對宋具有極大的國防利益。幽燕地區可以提供一道天然的國防線，也可以擴大宋軍戰馬的來源。太平興國八年(983)，宰相宋琪曾論述將來收取幽薊之後，只須在古北口、松亭關、野狐門三處戍兵，便能杜絕契丹之患。<sup>56</sup> 然而，在我們討論一個國家如何爭取和保護其利益時，不能忽略利益除了客觀存在之外，也含有主觀成分。換言之，甚麼才屬於國家利益，有一個界定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形態又發揮了作用。《邵氏聞見錄》的一段記載，揭示了弭兵與收復疆土兩大戰略目標含有潛在矛盾：

伯溫竊聞，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趙普〕，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sup>57</sup>

很多論著都批評趙普缺乏遠見，可是卻沒有分析為甚麼雄才大略的趙匡胤，竟然會無言以對？當然，《邵氏聞見錄》偏好收錄對熙豐新法及經略遼夏的不利言論，政治立場偏頗，史料的客觀性也有問題。不過趙普在另一個奏章中也說過「假令收下幽州，轉慮干戈不息」的話。<sup>58</sup> 無論如何，趙普和宋太祖的對話如果屬實，它的重要性不在曹翰死後誰來守幽州這個單純的人事問題，而在於它點出了宋初兩大戰略目標在本質上的分

<sup>53</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17。

<sup>54</sup> 《宋朝事實》，卷二十，頁320；《宋會要》，蕃夷一，頁767略同。

<sup>55</sup> 《宋大詔令集》卷二百二十八〈答契丹國書〉，頁884。

<sup>56</sup> 《長編》，卷二十四，頁557；《宋朝事實》，卷二十，頁321。

<sup>57</sup>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與范鎮《東齋記事》同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上，頁15；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六，頁53。

<sup>58</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15。

歧：縱使奪回幽燕，此後卻可能兵連不解，令和平遙遙無期。要是這樣，宋太祖又怎能不重頭苦思？後來他設立封樁庫，要以銀絹贖回土地，<sup>59</sup> 恐怕是這樣想出來的某種對策吧。

初，太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謂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若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會晏駕，不果。<sup>60</sup>

奪回幽燕地區既然作為北宋初年的戰略目標，但它與另一個可能取向——弭兵又有所分歧，如要相容共處，則對雙方的立場都要作出一定犧牲。其中可能的一種妥協是：弭兵論者不堅持反對暴力，而鼓吹收燕薊者也不堅持要立即付諸實行。王朴的「先南後北」說可以看成這種妥協的早期形式，其背後的原則是「先易後難」，攻取河東和幽薊較難，所以寧願等待南方平定後再行經略。宋初兼併諸國的具體次序和王朴略有不同，但趙普雪夜之謀也循著同樣思路：「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sup>61</sup> 在趙普的話中，北漢已不足畏，但契丹邊患仍是一大隱憂。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屢戰屢勝，最後仍無法攻陷太原，就採納薛化光的意見：

凡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賦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界西山，……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鄧、唐、汝州，給閑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可平定。<sup>62</sup>

他反對倚賴高風險的武力戰，而以圍堵來困弊敵人，等敵我對比發生巨大而有利的變化，才一舉消滅對方，這是典型的「間接路線戰略」。太常博士李光贊也主張：「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sup>63</sup> 薛化光和李光贊的言論反映出「弭兵」與「攻略」兩個大戰略取向，在「間接路線戰略」當中得到微妙的結合和共享的空間。將「寬力役之征」與「蕩平之策」密切掛鉤，既可以達成內部的穩定，減輕戰爭對國內經濟的破壞，表面上滿足了國內弭兵和安定的要求，但他主張對北漢施行的圍堵，企圖逐步削減對方的有生力量，屬於高壓政策，和

<sup>59</sup> 同上注，卷十九，頁436；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卷一，頁3。

<sup>60</sup> 《長編》，卷十九，頁436。

<sup>61</sup> 同上注，卷九，頁205。

<sup>62</sup> 范鎮：《東齋記事》，卷一，頁1-2；《長編》，卷十，頁225。

<sup>63</sup> 《長編》，卷十，頁225。

弭兵論風馬牛不相及。宋太祖接受了這種把內外兩套行爲模式共治一爐的策略，曾向太宗說：

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幣藏空虛。必先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即國用富饒矣。河東與契丹接境，若取之，則契丹之患，我當之也。姑存之以爲我屏翰，俟我富實則取之。<sup>64</sup>

到了宋太宗初年，南方已平，取太原也不再成爲極度困難的任務，「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昔先帝破此敵，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爲今日之事也」。<sup>65</sup>於是，宋太宗於太平興國四年大舉用兵消滅北漢，但卻和遼軍互有勝負，這時再講「先南後北」不但不合時宜，連它背後的「先易後難」的原則也失卻意義，於是有關戰略優先的討論就從圍繞「先南後北」變爲「先本後末」。持論者認爲在國力損耗較微的前提下，期望經過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北宋的國力將超越任何對手，因此面對頑強對手時，戰爭越遲發動越有利。張齊賢進而提出「本末論」，高唱「人民本也，疆土末也」，「契丹不足吞，幽薊不足取」。相對於李光贊的言論，張齊賢的「先本後末」說少了那分高壓意味，「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沒有倡言怎樣去俘略對方的人戶和搶割其禾麥，但他對於社會經濟經過休養生息之後，國力將凌駕契丹，仍是深信不疑：

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民既安利，則遠人斂衽而至矣。<sup>66</sup>

不論張齊賢，還是大多數持弭兵或間接路線戰略的論者都注意到，對強敵越遲開戰越有利這一假設，是建立在社會民生將大幅改善、整體國力將超越對手的前提上的。可是，事實上到雍熙三年爲止，這種預期中的有利形勢尚未出現。

從上文分析，宋初弭兵論有兩個層次：從理想標準，亦即作爲對暴力行爲的道德回應來看，它確實反映了晚唐五代以來久經戰亂、渴望和平的強烈願望。雖然它有文飾戰敗的附帶功能，但它之所以能起著文飾作用，還是由於它反映民情所向。宋初弭兵論欠缺的不是實質內容，而是背後深刻的意識形態基礎——它對暴力的本質欠缺深層的剖析和批判，也沒有對非暴力行爲提高昇華到如耶穌、佛祖的地步，因此極其量只能說是厭戰思想，而不能說是反戰思想。換言之，弭兵合符宋初的戰略利益，但弭兵論未足以構成一個戰略制約，<sup>67</sup>而只能起著拖延戰爭的作用。在另一個戰略目標「經略幽燕」面

<sup>64</sup> 王稱：《東都事略》（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年），卷二十三〈孟昶傳論〉，頁407-8；魏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一，頁1略同。

<sup>65</sup> 《長編》，卷二十，頁442-43。

<sup>66</sup> 同上注，卷二十一，頁484-85。

<sup>67</sup> 關於大戰略制約理論的綜述，見Rosecrance and Stein。

前，它顯得軟弱和容易妥協。從現實標準，亦即作為國家政策發生影響的一種思維來看，弭兵論反對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減低或延遲使用武力的論調，被吸納進間接路綫戰略中去。可是這種戰略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保持現狀對我方有利這一假設上的，一旦預期中的有利形勢未能出現，又或敵我形勢發生不利的變化，就可能迫使當局，在向敵人求和還是贏取決定性勝利這兩個迅速實現和平的方案之間，作一抉擇。

### 戰略形勢

公元十世紀的中國，經過唐末的離亂、五代數十年的混戰和宋初的統一戰爭，天下陷於兵火已逾百年。按照中國傳統治亂循環的規律，宋朝政府應當帶來一段安定繁榮的時代。可是，隨著太平興國四年(979)高粱河戰役的失敗，短期內結束戰爭的希望落空了，統一戰爭變成了宋遼戰爭。宋遼兩大強權孰強孰弱？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武力的強弱建立在文明的基礎上，單純從軍隊數目比較不同文明之間的軍事力量會遇到一定困難，因為科技、價值觀、風尚不一樣，衡量武力的標準便模糊起來。幸而中原文明和草原文明有一段長遠接觸的歷史，當兵力和其他戰略因素統合起來的比較結果，仍可提供一定參考作用。

首先是遼軍的兵力。遼軍總兵力不容易計算，各種來源的史料出入頗大，遼初君主直屬的皮室軍有說為數三萬至三十萬不等，此外就是太子、南北大王等親貴的私人武裝和奚、渤海、韃靼、室韋、女真、党項、沙陀、吐渾和漢兵。遼朝初年還有一支精兵，稱為屬珊，是國母述律氏的頭下，但這支二萬人的勁旅並不輕易出動，後來也很少見到有關活動的記載。到了980年代，五院、六院和奚部兵起而成為國家的主力部隊。<sup>68</sup> 不過各種記載間較為一致的是遼每次南侵所能動員的兵力約為十餘萬。《遼史·兵衛志》記載遼軍南侵有皇帝親征、重臣專征和近邊淺掠三種規模，後者「止遣騎兵六萬」，而重臣專征則已不下十五萬人，皇帝親征動員的兵力沒有具體記載，大概只會更多而不會更少。<sup>69</sup> 宋人也記載「每契丹南侵其眾不啻十萬」。<sup>70</sup>

至於宋軍的兵員，從數字上看，毫無疑問地高於遼軍，但步多馬少，佔不了明顯的優勢。太祖末年的禁軍名額為十九萬三千，加上廂軍則達三十七萬八千。太宗征河東，「駕前之兵蓋十餘萬」。<sup>71</sup> 經過高粱河的損折，宋軍在鎮、定、一帶仍能集結八萬大軍。<sup>72</sup> 當時關南屯軍的數字失載，而強大的駕前部隊還未算在內。因此估計北宋大概

<sup>68</sup> 陳烈：〈遼代部族軍考〉。

<sup>69</sup> 《遼史》卷三十四〈兵衛志〉，頁398-99。

<sup>70</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05；《宋史》卷二百六十四〈宋琪傳〉，頁9126略同。

<sup>71</sup> 曾鞏：《元豐類稿》（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卷四十九，頁2b。

<sup>72</sup> 《宋史》卷二百七十一〈趙延進傳〉，頁9300。



能出動二十萬作戰部隊來與遼軍周旋，似不為過。<sup>73</sup> 從兵種和兵力對比來分析，宋軍總兵力佔數量優勢，但遼軍以騎兵部隊為主，有利於快速集結和平原野戰。在局部戰場上，宋軍仍可能屈居下風。

然而任何一方意圖獲得短期內的決定性戰果，仍然很難。關鍵在於雙方的動員核心，都不在靠近前沿的地帶。雙方早期的勝負雖可能導致部分前沿地區的易手，但對長遠的軍事形勢而言，首輪攻擊的回報不大。觀諸宋軍軍官的籍貫除來自河北外，亦散布於較遠的山西和河南，<sup>74</sup> 似乎說明了宋軍兵源之廣。至於遼的幽燕地區，雖然有重大經濟價值，但並非替遼國提供主力部隊的所在。遼代留存下來的金石史料中散見一些漢軍將領的碑傳，裏面提及其保衛幽燕的貢獻；但從片言隻字之間，要斷定幽燕地區的漢軍實力有多強，還是會遇到一定困難。<sup>75</sup> 縱使遼奪取了關南，又或宋軍奪回幽燕，對雙方實力對比會有多大變化，還是很難斷言。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理解，也許會發現趙普的憂慮不是多餘的——「經略幽燕」並不一定能制契丹之死命，戰爭可能延續到下一代，到曹翰死後也還在打。用理論化的字眼可以說，宋遼戰爭的「零和性質」比較薄弱，首輪攻擊得手難以立即引起戰略力量對比的根本變化，戰爭也就較難了斷。<sup>76</sup>

從歷次會戰可以看出，五代和宋初的戰爭存在鮮明的分野。自李存勖滅梁後的歷次內戰中，骨牌效應相當明顯。李嗣源鄴都兵變(926)和潞王從珂鳳翔兵變(934)都展示著戰勝者滾雪球般的擴大戰果，而失敗者的士氣則一蹶不振。<sup>77</sup> 這和當時戰爭的掠奪性有關。宋太宗攻陷太原後，立即想進軍幽州，而大將崔翰力言「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sup>78</sup> 都是這類型戰略的延續。可是宋遼戰爭呈現和中原內戰不同的形態，雙方士氣相對穩定，會戰經常不止一個回合，要幾番進退才決定勝負。後晉時與契丹的幾場大戰已初步揭示這種特徵，特別是相州榆林店之戰(944)和陽城之圍(944)，晉軍在面臨絕境之際反敗為勝，最具戲劇性。<sup>79</sup> 在有遼軍參與的高平會戰中，周軍也制止了右翼兵潰的惡化，而最終奪取勝果。<sup>80</sup> 高粱河戰役初期，遼幽燕駐軍確有土崩瓦解的跡象，漢民也有翻城為變的意圖，但經過耶律學古、耶律休哥等力戰，終

<sup>73</sup> 《元豐類稿》，卷四十九，頁2b-3a。

<sup>74</sup> 何冠環：〈宋初三朝武將的量化分析——北宋統治階層的社會流動現象新探〉，《食貨》復刊第16卷第3、4期合刊(1986年12月)，頁19-31。

<sup>75</sup> 關於漢軍的地位，參見陳烈：〈遼代部族軍考〉；李錫厚：〈遼代的漢軍〉，《中國史研究》1989年第1期，頁98-105。部分漢將的碑誌，見《遼代石刻文編》，頁47-49，112-14，159-61，169-71，187-89。

<sup>76</sup> 有關「零和性質」與使用武力效益的關係，見Johnston, p. 149; Baldwin, pp. 3-25。

<sup>77</sup>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卷二百七十四，頁8958-78；卷二百七十八，頁9100-9144。

<sup>78</sup> 《長編》，卷二十，頁454。

<sup>79</sup>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頁9281-82，9288-90。

<sup>80</sup> 同上注，卷二百九十一，頁9504。

於宣告了宋太宗「促師奪燕」戰略意圖的失敗。<sup>81</sup> 瓦橋關戰役(980)中,宋兵前後四次敗而復鬥,<sup>82</sup> 也顯示出五代與宋初戰爭的分野。「骨牌效應」的減弱,標誌著任何一方都將更難獲得廉價的決定性勝利。

「零和性質」和「骨牌效應」的減弱,表示進攻的回報相應降低,而宋軍的勝利也主要從防守得來。從史書記載的表面數字來看,自979年開戰至986年以前,宋遼在石嶺關、高粱河、滿城、雁門、瓦橋關、唐興口六度交鋒,宋四勝二負,戰績並不壞。宋軍雖在比較重要的高粱河戰役中落敗,但戰勝的次數則超過遼人。<sup>83</sup> 可是換另一個角度分析,就可發現這六場戰役中守軍獲勝的比率極高,在六次中佔了五次,而只有瓦橋關戰役,遼軍獲得作為攻方唯一一次的勝利。

那麼守軍的勝利是如何獲致的?史書對戰役的片斷記載,揭示出宋遼雙方都有採取彈性防禦(elastic defense)和後發制人的手段。<sup>84</sup> 石嶺關之役蕭迪烈「以先鋒渡澗,未半,為宋人所擊,兵潰」。<sup>85</sup> 宋人江休復形容高粱河戰役後段,耶律休哥「並西山,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官軍南,席卷而北」。<sup>86</sup> 宋人在此打擊下傷亡慘重,王鞏說「[休哥]由間道邀我歸路,……帝疑救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沒」。<sup>87</sup> 宋軍在滿城會戰也採用同樣策略,在正面集結八萬大軍,「先陣於徐河」,另以崔彥進「潛師出黑蘆堤北,緣長城口,銜枚躡敵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sup>88</sup> 遼軍前後受敵「眾既奔,遇伏兵扼要路,[韓]匡嗣棄旗鼓遁」。<sup>89</sup> 潘美在次年雁門之戰踵其故智,「會敵十萬眾侵雁門,令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南嚮與美合擊之,敵眾大敗」。<sup>90</sup> 至於唐興之役,由於雙方的戰報太簡略,暫時無法作全面勾劃,但《遼史》兩處記載遼景宗御營在滿城失利,統軍使耶律

<sup>81</sup> 曾瑞龍:〈宋遼高粱河戰役考論〉,頁106-17。「促師奪燕」一語出於柳開:《河東先生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十五〈孟玄喆墓志〉,頁95。

<sup>82</sup> 《遼史》卷九〈景宗紀下〉,頁103-4;《宋史》卷二百七十二〈荆嗣傳〉,頁9311。

<sup>83</sup> 《遼史》沒有記載雁門之敗,但對其他三場敗陣都沒有漏載,見《遼史》卷九〈景宗紀下〉,頁101-2,105;卷七十四〈韓匡嗣傳〉,頁1234;卷八十四〈耶律沙傳〉,頁1307;同卷〈耶律善補傳〉,頁1310。

<sup>84</sup> 關於宋軍的彈性戰略防禦,見曾瑞龍:〈北宋與拜占庭帝國的彈性戰略防禦初探——兼論宋夏洪德城戰役(1092)〉,「元史及宋元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廣州:暨南大學,1997年)。論文部分內容經修改後,已通過發表於《史叢》。

<sup>85</sup> 《遼史》卷八十四〈耶律沙傳〉,頁1307。

<sup>86</sup> 《長編》,卷二十,頁457注引江休復《雜誌》。

<sup>87</sup> 王鞏:《聞見近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本(臺北:新興書局影印,1978年),第二十一輯第一冊,頁898。

<sup>88</sup> 《長編》,卷二十,頁462。

<sup>89</sup> 《遼史》卷七十四〈韓匡嗣傳〉,頁1234。

<sup>90</sup> 《長編》,卷二十一,頁472;《宋會要》,蕃夷一,頁7676。

善補中伏，被宋兵包圍，<sup>91</sup> 似乎宋軍也運用了設伏、夾擊等彈性防禦戰術。《遼史》卷九〈景宗紀〉的論贊說他「破軍殺將，……雖一取償於宋，得不償失」，<sup>92</sup> 雖然針對遼景宗個人而發，但換一個角度來作宏觀檢討，這番評論亦同樣恰當——除了瓦橋關一個特殊戰例外，在當時流行彈性防禦的戰爭中，攻方很難嚐到勝果。

宋遼戰爭還帶有濃厚的季節性。遼軍的特點是「寒而彌堅」，其出征的理想季節大約是十月至次年二月，很少超過四個月。<sup>93</sup> 雨季所引起的泥濘和弓膠軟化，成為契丹的大敵。982年三路南侵，全部被宋兵擊敗，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宋軍主力都是常備兵，照理說一年四季都可以作戰，但事實上同樣受天氣影響。避開對遼軍有利的嚴冬，是一個重要考慮。宋軍的主要武器弩，在嚴寒氣溫中難以張開。<sup>94</sup> 同時，為宋軍運送糧草的民夫會受農時所限，而導致宋軍的出征也帶有季節性。986年，宋太宗選擇在春末出擊，大受趙普批評，其中一個原因也是由於妨礙農時。「伏睹二月中，忽降使臣差般糧草。及詳敕命，知取幽州。彌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克復，俄及炎蒸，師老民疲，實增疑慮」。「鄧州五縣，其四在山，三分居民，二皆客戶。……典桑賣牛，十聞六七，亦有鬻男女，棄性命者。」<sup>95</sup> 雙方的出征都帶有季節性，令軍事行動的可預期性增高。宋人的術語「防秋」，本身就揭示了遼軍行動的季節性和可預期性。

自980年開始，雙方都著手強化現有邊界的防務。宋太宗在瓦橋關戰後，任命曹翰負責修葺雄州、霸州和平戎、破虜、乾寧等軍的城池，又開南河，由雄州抵莫州，以打開關南漕運。曹氏進行一項很大膽的嘗試，派數萬丁夫到敵境上伐木，來保障工程的木料供應。以上的工程，結果在數十日內完成。次年正月，太宗又派八作使郝守濬等巡視邊境河道，於是又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由是關南之漕悉通濟馬」。霸州淤口寨也就升格為破虜軍，雄州新鎮和易州太保寨也分別升格為平戎軍和平寨軍。<sup>96</sup> 特別重要的是保州的設施，使極具戰略價值的徐河流域得到一個足以依托前綫陣地的軍事重點。後來易州、滿城於989年失守，<sup>97</sup> 宋人就是沿著保州一帶，來重建其防禦體系

<sup>91</sup> 《遼史》卷九〈景宗紀下〉，頁105；卷八十四〈耶律善補傳〉，頁1310；《宋會要》，蕃夷一，頁7676-77記載是役宋軍斬獲五千餘級。

<sup>92</sup> 《遼史》卷九〈景宗紀下〉，頁105。

<sup>93</sup> 同上注，卷三十四〈兵衛志〉，頁398作「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然而以實例統計則似作十月至明年二月較妥。參Tsang Shui-lung, "War and Peace in Northern Sung China, Violence and Strategy in Flux"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97), pp. 91-93。

<sup>94</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24。

<sup>95</sup> 同上注，頁614。

<sup>96</sup> 同上注，卷二十一，頁483；卷二十三，頁488-92。

<sup>97</sup> 關於易州失守之年月，各書記載不一，詳細考證見伍伯常：〈易州失陷年月考——兼論南宋至清編纂北宋歷史的特色〉，載楊炎廷（編）：《宋史論文集：羅球慶老師榮休記念專輯》（香港：香港中國史研究會，1994年），頁1-19。

的。河東戰線方面，張齊賢在太平興國五年說：「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sup>98</sup> 在張齊賢眼中，宋人只用了短短一年時間，在鞏固河東邊防方面就取得可觀成果。不過遼軍也在鞏固邊防，981年，潘美偷襲了遼方的據點固軍，積粟屯兵，為久守之計。<sup>99</sup> 983年，宋高陽關捕獲契丹首領，供言「慮王師致討，頗於近邊築城為備」。<sup>100</sup> 由此可見，宋遼雙方都開始鞏固當時現有的陣綫，來作長期的抗爭的準備。

戰綫趨於堅固，而首輪攻擊不易制勝，這意味戰爭的性質已發展為持久戰。因為正面攻擊難以奏效，持久戰的特徵又表現在雙方對側翼局部優勢的重視。980年代初期，宋遼雙方激烈地爭奪西域與國，宋使王延德出使韃靼，途經高昌，剛好遼使也在那裏，勸高昌王：「漢使來覘王封域，將有異圖。」王延德知道後，想殺掉遼使，被高昌王「固勸而止」，可見雙方爭奪盟國之激烈。<sup>101</sup> 在河東戰綫西翼，遼人一直致力於分化府州折氏和豐州王氏這兩個宋的世襲知州家族，但卻遭到力拒。從982到983年，遼軍連續發起對府州和豐州的攻略，但都被折御卿和王承美所破。<sup>102</sup> 恰好夏州定難軍留後李繼捧向宋獻地，令宋的側翼有利形勢更趨穩定。宋廷則一方面力圖鞏固側翼，給折御卿、王承美加官進爵，另一方面則向遼側後各部族施以外交攻勢。很明顯，宋人對於位於遼後方渤海和定安國的招攬，會造成對遼外交圍堵，不過由於距離遙遠，交通不便，難以達成實質上的軍事合作。宋太宗對渤海許以封賞，承諾：「幽薊土宇，復歸中原，朔漠之外，悉以相與。」而遼軍也接獲宋軍大舉聚糧邊境、主將赴五臺山視察的報告，一度戰雲密布。<sup>103</sup> 另一方面，宋和高麗女真也保持密切關係，致力通商買馬，<sup>104</sup> 對遼構成潛在的側翼威脅。在前綫僵持不下之際，遼國把握了時間經略東方。遼聖宗統和元年(983)遼軍開始集結兵力，次年初，連續兩次擊敗女真。到985年夏天，遼軍集結重兵，大舉進攻高麗，宋太宗一手建構的國際圍堵，面臨土崩瓦解。<sup>105</sup>

當然，宋太宗也爭取了時間來整飭內部，穩定統治。在勵精圖治的同時，太宗對諸將習以為常的不法事端顯得不能容忍。自980年開始，巨案迭出。首先是秦州伐木案，

<sup>98</sup> 《長編》，卷二十一，頁484。

<sup>99</sup> 同上注，卷二十二，頁489。

<sup>100</sup> 同上注，卷二十四，頁556；《宋朝事實》，卷二十，頁320。

<sup>101</sup> 《長編》，卷二十五，頁578-79。

<sup>102</sup> 同上注，卷二十三，頁520，531；卷二十四，頁540。

<sup>103</sup> 參見《長編》，卷二十二，頁492；《宋史》卷四百九十六《渤海國傳》，頁14130；《遼史》卷十〈聖宗紀上〉，頁109。

<sup>104</sup> 張齊賢曾在咸平五年追述：「舊日女真賣馬，歲不下萬匹，今日為契丹所隔。」（《長編》，卷五十一，頁1122）

<sup>105</sup> 《遼史》卷十〈聖宗紀上〉，頁113-16。有關討論，見廖隆盛：〈宋太宗的聯夷攻遼外交及其二次北伐〉。

暴露了武將間走私木材的情況，連駙馬王承衍、石保吉都牽連在內。<sup>106</sup> 982年王仁瞻貪贓案則更為嚴重，因為王是全國最高級武官之一，而且同時掌握三司這個國家財政部門。據說他侵吞的公款達千萬計。<sup>107</sup> 同年，宦官江守鈞擅自貸款給大將崔彥進和曹翰的事情又遭揭發，官方並沒有指控他賄賂，但由於江守鈞經常擔任前沿戰區的監軍，為了防止內臣和武將勾結，也不得不加以處分。<sup>108</sup> 次年，整肅變本加厲，樞密使曹彬遭到誣告而被罷免，徹查後發現無罪。<sup>109</sup> 繼而，威塞軍節度使曹翰被控侵吞公款和非法聚斂，判處死緩，削奪所有官職。<sup>110</sup> 在此附帶一提的還有秦王廷美案，宋太宗逼死親弟來鞏固權位，<sup>111</sup> 此事與戰略制訂並無直接關係，但亦不妨視為整頓內部的重要一環。到這一年年底，宋太宗才稍感滿意地說，「近者內外政事、漸成條貫，遠近官吏，無不畏謹，朕思之，不覺自喜」。<sup>112</sup>

可是社會經濟的情況卻未許樂觀。張齊賢在981年上的奏章描述了江南地區的殘破狀態，市井蕭條，人民困乏，還經常誤觸法網而被沒收財產，甚至賣掉妻兒來抵償。他又諫請朝廷不要再揀點江南百姓當兵，以免滋擾。<sup>113</sup> 四川交通不便，官方常動用丁男運送上供財物，知河南府何承矩認為疲民橫役，應當廢止。結果朝廷下令西川、荆南、嶺南和陝西錢物，改由傳置卒代運。值得注意的是何承矩乃四世將門之後，可見讓人民息肩的看法並非文人所專有。<sup>114</sup> 982年，知桐廬縣刁衍上疏，指出許多衙門都濫用私刑，請求嚴禁。<sup>115</sup> 太宗本人也察覺到民力艱難，一次參觀製藤器時，看見每斤藤中合用的只有三兩多，便想起這些藤由六、七千里外運來，「虛為勞費」，便下令以後只許運送合用的部分上京，節省力役。<sup>116</sup> 國子博士李覺在986上言提議鼓勵開荒，提及當時天下很多荒田無人耕種，「有力者無田可耕，有田者無力可種」，<sup>117</sup> 可見農村經濟未達繁富之一斑。

宋太宗和宰相宋琪在982至985年相繼作出過一系列對敵情樂觀的言論。仔細玩味這些話，可以發現其背後有著不足為外人道的隱衷，而不一定說明宋人對敵情的估計。宋

<sup>106</sup> 《長編》，卷二十一，頁478；《宋史》卷二百五十〈石保吉傳〉，頁8981。

<sup>107</sup> 《長編》，卷二十三，頁513。

<sup>108</sup> 同上注，頁525。

<sup>109</sup> 同上注，卷二十四，頁537，544；《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曹彬傳〉，頁8981。

<sup>110</sup> 《長編》，卷二十四，頁546。

<sup>111</sup> 同上注，卷二十三，頁516-18，520；卷二十五，頁572。

<sup>112</sup> 同上注，卷二十四，頁554。

<sup>113</sup> 同上注，卷二十一，頁485；卷二十二，頁508-9。

<sup>114</sup> 同上注，卷二十三，頁514。關於何承矩之家世，見《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何福進傳〉，頁1628；《宋史》卷二百七十三〈何繼筠傳〉，頁9326-28。

<sup>115</sup> 《長編》，卷二十三，頁532。

<sup>116</sup> 同上注，卷二十四，頁554。

<sup>117</sup> 同上注，卷二十七，頁620。

太宗的言論具有雙重意義。在982年前後，這些言論爲他向契丹嘗試接觸講和作好政治輿論準備，可是初步接觸失敗，到了983年以後他對敵情樂觀的言論一轉而爲使用武力張本。當宋軍在982取得唐興之捷，繼而遼景宗去世，宋太宗高唱「朕每讀《老子》，至『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sup>118</sup>更下詔緣邊州軍，說「雖彼曲可見，而罪己良多，今聞邊境謐寧，田秋豐稔，軍民所宜安堵，無或相侵。如今後輒入北界擄掠及盜竊，亦仰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物，並送還之」。<sup>119</sup>《遼史》記載982年聖宗剛即位，「十二月戊午朔，……辛酉，南京留守荆王道隱奏宋遣使獻犀帶請和，詔以無書卻之」。<sup>120</sup>簡言之，宋太宗乘遼朝新君即位的機會，來試探講和的可能性，表面上公然高唱弭兵，是爲了掩飾向敵人求和的事實。在這個環節，弭兵論起著文飾作用。

可是求和被拒，宋廷的弭兵論沒有實質的出路。於是在983年，高陽關捕得戰俘，供稱遼朝內部「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於近邊築城爲備」，宋太宗似乎在考慮使用武力。<sup>121</sup>宋琪當即指出，「自石嶺關之敗，平繼元，緣邊諸郡，頗有克捷」。但他馬上又補充一句：「以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矣，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滅亡。」<sup>122</sup>過了一段日子，太宗又和他討論北方形勢，說根據諜報，「自朝廷增修邊備，北人甚懼」。甚至威虜軍守將屬下的財計吏挾財私奔，到了遼界的涿州，也被遣返。太宗認爲遼朝已不敢製造邊界衝突，很有信心的說：「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欲以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宋琪當即表示同意，但又立即指出，「況奚族是契丹世仇，儻以恩信招之，俾爲外禦，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sup>123</sup>這樣，宋琪又一次表示了不贊成大舉用兵。985年春，太宗和宋琪談起幽燕地區的領土問題，語氣有些轉變，抨擊石晉的割地政策，而宋琪也對以「方今亭障肅清，生靈安泰，皆由得制禦之道，恢復舊境，亦應有時」。<sup>124</sup>

據以上三次對話，宋太宗和宋琪對敵情都作了樂觀的言論。他們固然向有利的情報靠攏，將遼軍修築城寨和用兵高麗誇大爲「種族攜異」，但不大可能真正相信契丹快要崩潰。如果這些話足以代表他們對時局的認識，亦即相信契丹「種族攜異」，已面臨崩潰的邊緣的話，那麼他們竟然各自擬定一個小心翼翼的作戰計劃，是難以理解的。對於宋太宗來說，他片面強調樂觀因素，背後容有隱衷亦未可知。他三年前下詔息兵，尋求

<sup>118</sup> 同上注，卷二十三，頁528。

<sup>119</sup> 《宋朝事實》，卷二十，頁320。

<sup>120</sup> 《遼史》卷十〈聖宗紀一〉，頁108。

<sup>121</sup> 太宗由主張弭兵到考慮使用武力的詳細過程，見張其凡：〈從高粱河之敗到雍熙北征〉，及《宋太宗》，頁135-41。

<sup>122</sup> 《長編》，卷二十四，頁556-57。

<sup>123</sup> 同上注，頁557。

<sup>124</sup> 同上注，卷二十六，頁594-95。

弭兵已天下皆知，但求和卻又被拒，無法下臺階，要另起戰端，必須仗賴有利的情報。因此983年後宋太宗對敵情的樂觀言論不再歸結於弭兵，一轉而為使用武力鋪路。相反，宋琪沒有這個政治臺階要下，他可以表面上附和太宗的樂觀分析，卻一再歸納到「不須致討」的結論上。986年初，太宗懷疑宋琪結黨，將他罷免。<sup>125</sup> 宋琪任相期間宋廷沒有輕啟邊釁，反而在他罷相後一月，宋太宗即大舉用兵，而宋琪唯有書面上疏來討論軍事戰略，這種不尋常的處境，正說明了君臣二人若即若離的關係。

宋琪離開了相位，宋太宗便索性撇開文官系統的臣僚，與一伙心腹近臣謀議北伐。史書描述賀令圖、侯莫陳利用等無知、輕浮和佞倖之輩，竟說服了太宗大舉用兵，其理由是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sup>126</sup> 「又訪得……蕭氏與韓〔德讓〕私通，遣人縊殺其妻，遂入居帳中，同起臥如夫妻，共案而食。……國事皆蕭氏與韓參決。……部族有竊議者，為其黨所告，蕭氏盡戮之。隆緒亦惡其事，畏不敢發，然蕭氏亦常懼及禍。……帝聞之，遂下詔三道進討」。<sup>127</sup> 這些都是為宋太宗首謀諱飾。其實「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sup>128</sup>

## 作戰計劃

戰爭是人類歷史上最激烈、最瞬息萬變的活動之一。雖然我們已不再如古人那般相信歷史就是是連串軍事活動的後果，但人類對戰爭的憂心忡忡，仍在於它那種激烈性和破壞性——長年累月所醞釀的巨變，往往在一天的決戰中表露無遺。戰爭是各種變數裏最集中，最難有定論，也最引起激辯和反思的。對於軍事失敗，自古以來不乏名賢作過精警的論斷，可是嚴格的研究，是近年才逐步在探索中發展，也成為戰爭史中備受關注的一個方向。在1990年，柯恩(Eliot Cohen)和顧慈(John Gooch)對傳統以來對於軍事災難的解釋作了全面檢討，認為要為戰敗歸咎於某些人，一點也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從理論入手具體地解釋軍事災難。尤其是歷史上存在大量富於爭議性的戰役，它們似乎都有精巧的作戰計劃，但其不幸失敗令後世很難給予恰當的評價。<sup>129</sup> 因此對作戰計劃的探討，成為戰略決策研究的一個重點。

<sup>125</sup>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宋琪傳〉，頁9123。

<sup>126</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02。

<sup>127</sup> 《宋會要》，蕃夷一，頁7677。

<sup>128</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18。

<sup>129</sup> A. Eliot Cohen and John Gooch, *Military Misfortunes: 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0). 此外，並非純學術著作，但也頗有見地的有Charles Fair, *From the Jaws of Vic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1)和Barbara W. Truchman, *The March of Folly: From Troy to Vietna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4)。

對這些功虧一簣的作戰計劃難以評價，集中體現為兩個矛盾：一個是方法論上的；另一個是戰略上的。方法論的矛盾，在於歷史學的局限性不能完全滿足人們對往事定位的需求。歷史學家只能解釋已經發生的事情，對於那些「失去的勝利」暫時仍沒有很客觀的標準來處理。<sup>130</sup> 很多經過高度運思的作戰計劃，在失敗之後常背起「不切實際」的污名；反而冒險成功，就常常贏得容或無端的美譽。可見純從效果立論，對設計者來說，不盡公平。何況所謂「正確」的戰略，在執行時仍可能發生難以預測的變故，因此如何籌劃始「實際」，很難定出一個標準。

至於戰略上的矛盾，則出現在大戰略和戰役兩個層次的課題不一致上。大戰略的課題是如何在政治外交和國力方面凌駕對方，或保持相對均衡；但是戰役的課題卻正在實力相當或僅略佔優勢時如何迅速打垮對手。因此，實力對比上的壓倒性優勢，並非戰役法的先決條件；相反，一位名將往往能運用有限資源，透過軍事勝利來改變敵我戰略力量的對比。歷史上大量戰役都是在沒有任何一方佔壓倒性優勢之下進行的。有抱負的作戰計劃，通常不具備戰略資源上的巨大優勢，我們會從大堆數字圖表之外發現「詐降」、「聲東擊西」、「夜襲」、「空城計」等等詭計成分。要是它們不幸失敗，我們憑甚麼標準來判定作戰計劃本來「也很有可能成功」呢？

「雍熙北伐」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例子。宋太宗和他的親信精心策劃的「聲東擊西」之計結果落得慘敗收場，令近代學者對這一類預先設定的作戰計劃不存好感，甚至進而視之為束縛武臣的政治行爲。然而在歷史長河中，作戰計劃在軍事行動中的角色日益舉足輕重，是戰爭複雜化的結果，和個別君主的性格或個別朝代的特殊政策無必然關係。朝廷要求將領按照計劃完成指定任務，可以完全不帶任何政治目的。在這個轉變歷程中，作戰計劃被加以政治化，利用來強化君主專制，容或有之；但至於作戰計劃的制定和執行，不論君主參預與否，都屬於純粹軍事業務本身的範疇，需要從軍事的標準去評價。<sup>131</sup>

作戰計劃有三個層次：即戰略目標、作戰意圖和戰役手段，對作戰計劃的討論因此也圍繞在三者的關係上。戰役意圖是甚麼在多大程度上服務於戰略目標？戰役手段、計

<sup>130</sup> 歷史學對於沒有發生的事情是不能處理的，我們不能斷定假如漢尼拔在坎尼(Cannae)大捷之後大舉進攻羅馬，又或項羽真的一箭射死了劉邦，歷史會發生甚麼變化。可是人們偏偏喜歡問這類「如果」的問題，從互聯網絡上那些「如果歷史變成那樣……」(If History Became ...)的網上論壇，可以看到他們對討論這些「不存在的歷史」是何等熱衷。要說這些純然是無聊的鑽牛角尖嗎？好像又不盡然。歷史提供對過往事情的定位，不論成敗，或在人們心中時輕時重，總有個位置。可是那些「失去的勝利」卻不然，由於從來沒有發生，被嚴格的歷史學棄置一旁，但又揮之不去，於是野史和口頭傳說等等非嚴格的歷史就迅速填補人們心中這個缺陷，這樣也許可以解釋一般人對於諸葛亮出師祁山，又或拿破崙的滑鐵盧戰役何以如此津津樂道，而正史又好像始終也未能提供完善的解釋。

<sup>131</sup> Tsang Shui-lung, "The Control of Military Operation in Early Sung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Western Conference of American Asian Studies, 1994).



劃安排的具體軍事行動能否鮮明地反映意圖？計劃安排的具體軍事行動可否執行？是否合符戰場現實？由於年代久遠，對於實際情況所知有限，我們對第三方面的論述有限，只能集中在前兩方面。

史書並沒有明顯地記載到底由哪些人協助太宗制訂計劃，這項工作似在樞密院內秘密進行。由於無法看到作戰計劃的全文，目前只能根據兩段僅存史料，配合其他枝節來進行了解。首先，據一項記載提到太宗給予諸將的命令，說：

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得貪利以要敵。敵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於山後矣。」<sup>132</sup>

太宗後來手詔答趙普時，也透露其作戰意圖：

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間，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共力驅攘，俾契丹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sup>133</sup>

宋太宗吸收了高粱河戰役孤軍深入，決成敗於一戰的教訓，而改採比較複雜而迂迴的路向，以正面吸引對方，然後發動側翼突擊來奪取敵軍重點防禦的據點。無論如何，古今兵法很少有說這種意圖是錯的。尤其是李德哈特(Liddell Hart)的學說，可能會為宋太宗提供一點辯護的餘地。他總結了二千五百年以來西方歷史上的決定性戰役，指出幾乎所有的例證都顯示，決定性勝利並非單純由軍力衝突造成，而是某一方先讓對方喪失協調和平衡所致。要令對手失去平衡，則必須循間接路綫，而非直接強攻所能做到。隱藏主要意圖，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所謂間接路綫的主要精神，也符合中國人「先勝而後戰」的兵法原則。<sup>134</sup>毫無疑問，宋太宗此役所運用的聲東擊西之計，也是一種間接路綫。他要曹彬聲言取幽州，「敵聞之，則不暇為援於山後矣」，就是一種出其不意的構想。不過，李德哈特儘管證明了大部分決定性勝利都由間接路綫所導致，卻無法證明大部分間接路綫戰略都能得到勝利。歷史上有不少具有間接路綫意圖，但結果因各種原因而失敗的戰役沒有被充分研究。這暴露了目前戰爭史研究的局限性，也是李德哈特學說的一個遺憾之處。無論如何，間接路綫戰略不一定是萬應靈藥，也不是評價軍事行動的唯一標準。

細味前引宋太宗的兩段話，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宋太宗對於戰略目標的認識，似有含混之嫌。他說只要曹彬牽制住遼軍，對方將會「不暇為援於山後矣」，如果他以奪取

<sup>132</sup> 《長編》，卷二七，頁612。

<sup>133</sup> 同上注，頁617；《宋會要》兵八〈討叛二〉，頁6887-9記載較詳盡。

<sup>134</sup> Liddell B. H. Hart, *Strateg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first edition, 1954;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second revised edition, 1967).

「山後」作為計劃的軍事目標，則這個戰役計劃並無不妥。然而他又提到平定山後，「俟一、兩月間」，再和東路合力夾擊幽州，可見位於「山前」的幽州才是最終的戰略目標，而奪取山後只是作為奪取山前的手段。這裏面有兩重假設——得到了山後，「共力驅攘」，幽州會很快易手，這是第一重假設。等幽州到手了，遼軍會無法立足而退出塞外，這是第二重假設。為了這兩重假設來花了好一番佯動和配合的工夫，是否值得？固然，基於幽州的重要性，我們或許有理由作第二個假設，但第一個假設能否成立，則比較難以確定。如果山後真的那樣重要，宋太宗應該以主力部隊來擔任迂迴，但他計不出此，結果受到專家的批評。<sup>135</sup>

問題的癥結在於，宋太宗的迂迴戰略沒有威脅對方的補給和退卻綫，也好像沒有殲滅遼軍主力的可能。一般軍事上的迂迴行動，目的是切斷對方的退路和補給，即使不能加以全殲，至少可以令對方畏懼而向後收縮，讓出土地。潘美和田重進略地山後，然後向東進逼幽州，聯同曹彬夾擊的設想，未能威脅遼國幽燕佔領地同後方的聯繫。遼朝當時正在用兵高麗，遼軍增援幽州的主要路綫，不在西北方的山後地區，而是遼東向西穿越榆關(山海關)而進入平、營二州。縱然遼軍最後戰敗，也可以保存主力，撤出關外。

遼廷最擔憂的其實也是平州海岸的安全。平州(今盧龍縣)控制榆關(今山海關)走廊，若遭宋軍切斷，則遼軍必須改取松亭關和古北口，對增援燕南造成極大不便。三月中曹彬首次攻陷涿州，遼廷立即「詔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宋」。遼廷在下詔給蕭勤德的同時，又特別知會平州節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人趣行；馬乏則括民馬；鎧甲闕，則取於顯州之甲坊」。<sup>136</sup> 以此足見遼廷對平州海岸防務之高度重視。

誠然，要切斷平州至榆關大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白溝河下游的低窪地帶一方面替河朔平原提供了良好的掩護，但也反過來阻擋宋軍的前進。對於宋軍有無可能切斷遼軍這條生命線，目前還欠缺史料作深入分析。不過零碎記載顯示，宋廷直至兵敗歧溝關之後，方才有點在這一帶展開軍事活動的跡象，任命「左衛上將軍張永德知滄州，右衛上將軍宋偓知霸州，右驍衛上將軍劉廷讓知雄州，蔚州觀察使趙延溥知貝州」。<sup>137</sup> 後來宋太宗將李繼隆遷任為滄州都部署。<sup>138</sup> 滄州和平州隔海相對，一向並非邊防劇要，通常不設都部署，因此李繼隆的任命可能與策動攻勢有關。無獨有偶，《遼史》也記載年底的君子館戰役：

<sup>135</sup> 杜成安：〈評宋太宗雍熙北伐的戰略意圖〉。

<sup>136</sup> 《遼史》卷十一〈聖宗本紀二〉，頁120。

<sup>137</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18-19。

<sup>138</sup>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處耘傳〉附〈李繼隆傳〉云：「太宗益嘉其有謀。……契丹大入邊，出為滄州都部署。」(頁8965)《長編》卷二十七述君子館戰役，亦載繼隆為滄州都部署(頁625)。

及太后南征，休哥為先鋒，敗宋兵於望都。時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哥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sup>139</sup>

綜合上述有史料，可以發現宋軍有一定迹象在滄州方向進窺平州海岸，不過那是雍熙三年年底的事。年頭宋軍發動北伐之初，沒有從這個方向進兵，也沒有其他手段來遲滯遼軍主力增援幽州，因此戰役勝敗的關鍵，就繫乎遼軍能否迅速從高麗前綫轉移兵力來投入幽州附近，展開戰術決戰。

總上對於宋太宗及其親信所擬定的作戰計劃的評論，可作一個初步的歸結：宋太宗採用聲東擊西之計，在東路部署大軍，牽制對手兵力，同時選擇敵軍守備空虛的西路突破，席卷山後雲、應等州。此舉具有「間接路綫戰略」的意味，雖令兵力分散，但非失敗的致命原因。所應該批評的是，他雖然使用了佯動的手段來迷惑敵人，並要求部下嚴格遵循計劃行事，但突破的主要方向並沒有對準戰略目標幽州，充其量只能得到收取山後的有利形勢，但如何把這種形勢發展成決定性勝利，則欠鮮明。遼人可能會被宋軍連克州縣的聲勢壓倒，「遠遁沙漠」，但也可能傾盡全力來幽州附近決戰。總之，如何取捨的決定權在對方，而宋軍對於萬一需要在幽州外圍決戰，仍然欠缺明朗的「成算」。

無獨有偶，在攻勢發動前，剛卸任的宰相宋琪也擬定了另一個作戰計劃，以奏疏形式呈上。<sup>140</sup> 太宗本來十分賞識宋琪，「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為相」。<sup>141</sup> 他自幼生於邊塞，對幽燕地區十分了解。可是他的意見並沒有被採納。史書上說「疏上，頗採用之」，恐怕指奏疏的枝節部分而言，而非其精神所在。曹彬的主力居然從宋琪極力反對的「雄、霸路直進」，就是明證。歷史學家也許永遠無法回答，如果宋太宗在這場開國以來規模最為浩大的戰役採用了宋琪的作戰計劃，能否避免慘敗收場。然而饒有興味的是，宋琪這位生於邊陲的策士，對於經略幽燕具有一套獨特的看法。

宋琪的「平燕之策」，此較明確地將幽州作為戰略目標。與宋太宗的聲東擊西相反，宋琪主張集結重兵，從中央山地突破。吸收了高粱河戰役的教訓，他看出必須利用地形優勢來抵銷契丹騎兵的衝刺力，所以對進軍路綫的制定，斷然採用山路，並盡量佔據水源上游，居高臨下，有備而戰。他的構想以易州為出發基地，傍呂梁山脈向東北進發，「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此外，考慮到遼的奚族步兵可能威脅兩側交通綫，他提議設立一些小型的機動部隊往來遊弋，以禦奔衝。直到抵達幽州城西四十里外，就是平地，大軍壓城之餘，要同時將桑乾河水引入高粱河，使其氾濫，在幽州以北形成一道水

<sup>139</sup> 《遼史》卷八十三〈耶律休哥傳〉，頁1301。

<sup>140</sup> 宋琪疏見《宋史》卷二百六十四〈宋琪傳〉，頁9123-29；及《長編》，卷二十七，頁603-8略同。然《宋史》繫年作端拱二年(989)，《長編》改訂為雍熙三年。細察奏疏內容與端拱二年戰況不相合，應以李燾改訂為是。

<sup>141</sup>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宋琪傳〉，頁9123。

障。「賊騎來援，已隔水矣」。這樣，估計宋軍就能贏得十天左右，來攻取幽州。宋琪假設幽州易手，山前山後各州必然相率歸附，而遼軍只能退出塞外。<sup>142</sup> 換言之，軍事勝利將發展為政治勝利。這樣的估計是否充分，現在已難準確判斷。

後來曹彬的大軍在岐溝關的平野被遼騎擊潰的事實，似乎證明宋琪確有先見之明。當然，戰略分析的立場不允許當「事後孔明」，但縱使不談宋兵失敗的結果而光從作戰計劃本身來看，宋琪的方案與宋太宗的作戰計劃相比仍有兩個優點。首先，他的目標和手段比較一致。他很明確地將幽州當作軍事目標來奪取，而整個行動都圍繞著攻取幽州為核心。更重要的是，他將戰術層次的因素和戰役層次的因素緊扣起來考慮。由於考慮到對方騎戰的優勢，他採取山地為主的行軍路線；由於考慮到幽州城下決戰的風險，他才要佔領上游，以備水灌高粱河，將契丹援軍阻絕水北。他的計劃處處針對契丹騎兵的衝擊而設定對抗手段，表現出即使以某些現代的標準來說也屬於典型的戰略思維。<sup>143</sup> 宋太宗沒有按照宋琪的建議從易州山路進兵，而將主力曹彬麾下十餘萬大軍屯於雄州，牽制遼軍，製造機會給潘美、田重進在山後大舉突破；不幸曹彬又「不遵成算，速取其郡縣」，客觀上構成了宋琪所最擔心的「從雄、霸路直進」的戰況；而其結果，也就「未免更有陽城之圍」，損失慘重。

戰役由三月初發動，遼軍一開始便處於被動捱打的狀況，但抵抗相當激烈。八年前宋太宗進軍高粱河，一度出現「骨牌效應」，遼將和軍民相繼歸降，和這次的惡戰判然有別。幽燕百姓「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sup>144</sup> 但八年前帶備牛酒公然迎降的景象卻看不到了。<sup>145</sup> 奚相賀斯、渤海將大鵬翼都率領遼軍力戰抗宋而敗。<sup>146</sup> 宋軍攻陷了涿州和雲州，而寰州、朔州和飛狐都在激戰之後才投降。應州和靈丘名義上是主動投降，但應州鄰近寰州，靈丘在飛狐附近，守軍投降的決定當仍受到鄰近地區的戰果影響。<sup>147</sup> 有一名向宋將米信詐降的遼將，後來發現是想拖延時間從幽州補給箭矢。<sup>148</sup>

<sup>142</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03-4；《宋史》卷二百六十四〈宋琪傳〉，頁9124略同。

<sup>143</sup> 有關現代戰略將技術、戰術、戰役層層緊扣的立體思維方式，見Edward Luttwak, *Strategy: 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8, 180-81.

<sup>144</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12。

<sup>145</sup> 同上注，卷二十，頁455-56；《宋史》卷四〈太宗紀二〉，頁62-63。

<sup>146</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09；田錫：《咸平集》，《四庫全書珍本四集》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缺出版日期），卷二十三〈賀潘美奏勝捷表〉，頁12a-12b；《宋會要》兵八〈討叛二〉，頁6888-89。

<sup>147</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08-12；《遼史》卷十一〈聖宗紀二〉，頁120-21；《咸平集》卷二十三〈賀曹彬奏勝捷表〉，頁11b；同卷〈賀容懷意奏勝捷表〉，頁13a-13b；同卷〈賀潘吉奏勝捷表〉，頁14a-14b；同卷〈賀張明奏勝捷表〉，頁15b-16a；同卷〈賀簡昌壽勝捷表〉，頁16b-17a。

<sup>148</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13。

遼軍雖然處於下風，但幽燕地區的統治沒有崩潰；相反，增援部隊相繼抵達。南京守將耶律休哥因北、南二院及奚部精兵未至，先收縮兵力，以輕騎騷擾宋人糧道。爲了爭取時間從高麗前綫轉移兵力，承天太后和遼聖宗一面下令從諸部徵兵赴燕，一面促東京留守耶律抹只率部赴援。三月下旬，宋將田重進大破遼軍於飛狐口，生擒大鵬翼。四月初，潘美攻陷雲州。當時遼數路援軍已聚集幽州外圍，先後向山後派遣兩部突騎和步兵增援蔚州，並以耶律斜軫主持山後軍事。<sup>149</sup> 援兵抵達後，蔚州已投降田重進，宋軍將城中輜重一概搬走，留下一座空城。遼兵追至，宋將荆嗣「與敵轉戰，時軍校五輩，其四悉以戰死。至大嶺，嗣力鬥，敵始卻」。<sup>150</sup>

宋軍的形勢開始不妙。東路曹彬的主力初期因挺進過急而缺糧，一度退回雄州，宋太宗知道後大爲焦急，諸將又「謀議蜂起」，請求再取涿州，「彬不能制」，於是再帶五十日軍糧出擊。「敵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才百里，歷二十日始至」。曹彬到達後發現軍糧又不夠了，退兵之際，爲敵所乘。五月初，耶律休哥在歧溝關追上宋軍，宋軍大潰。<sup>151</sup> 宋太宗馬上下令各路退兵，但又因掩護山後吏民撤退，損失了驍將楊業。是年年底，遼軍大舉入侵，宋關南部署司全軍覆沒，前後損失數萬人。<sup>152</sup> 「自此宋不敢北向」，<sup>153</sup> 直到北宋末年，「經略幽燕」不再在戰略取向中享有優先。

## 結 論

「雍熙北伐」是北宋初年兩大戰略目的——「弭兵息戰」與「經略幽燕」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妥協後，最終不能共存的產物。宋初弭兵論由於自身理論上有欠澈底，其原則上的模糊不清和實踐時的多重性格，在現實戰略面前表露無遺。經過一連串妥協，衍生爲間接路綫大戰略——寄望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後國力能凌駕契丹，在收復疆土，驅除外敵的過程中避免較大的戰鬥風險。可是從982至986年短暫的休戰期間，戰略力量的對比不但沒有發生對宋人有利的巨大變化，反而讓遼朝得以掃定東北其餘部族。相反，宋太宗只能穩定個人權力，而民生仍有待改善。那樣，宋太宗和他的親信惟有一廂情願地將遼國的東征理解爲部族攜異，更乘遼軍兵力東調的短暫空擋發動進攻，企圖以聲東擊西之計攫取戰略制動權。在宋太宗及其親信的謀劃當中，間接路綫戰略的色彩相當濃厚，也考慮到協調、補給等問題，評價不應太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間接路綫

<sup>149</sup> 《遼史》卷十一〈聖宗紀二〉，頁120-21；卷八十三〈耶律休哥傳〉，頁1300。北南二院及奚部兵在此役完全顯出作爲遼朝軍力支柱的地位，見陳烈：《遼代部族軍考》。

<sup>150</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11-12。蔚州兵變降宋，見《咸平集》卷二十三〈賀張沖奏勝捷表〉，頁17b-18a。

<sup>151</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12-13。《宋會要》兵八〈討叛二〉，頁6889-90。

<sup>152</sup> 《長編》，卷二十七，頁621-27；卷二十八，頁631。

<sup>153</sup> 《遼史》卷八十三〈耶律休哥傳〉，頁1301。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戰略經過幾番修正之後——從寄望整體國力的超越，先勝而後戰；到誇大敵軍內部不和，後方空虛；又再到寄望於聲東擊西的成功——制勝的要素越來越取決於特定事項，換言之，越來越不能承受局部的失誤，也就是風險越來越高。作戰發動之後，雙方士氣高昂，成敗便取決於遼軍增援的速度和宋軍內部達成作戰計劃的協調。由於遼軍在赴援幽州的行動中表現極大的決心，宋軍縱使成功地奪取山後，也難以避免在幽州外圍進行大決戰，加上宋軍一再出現人為失誤，在此後所遇到的災難，也比預期中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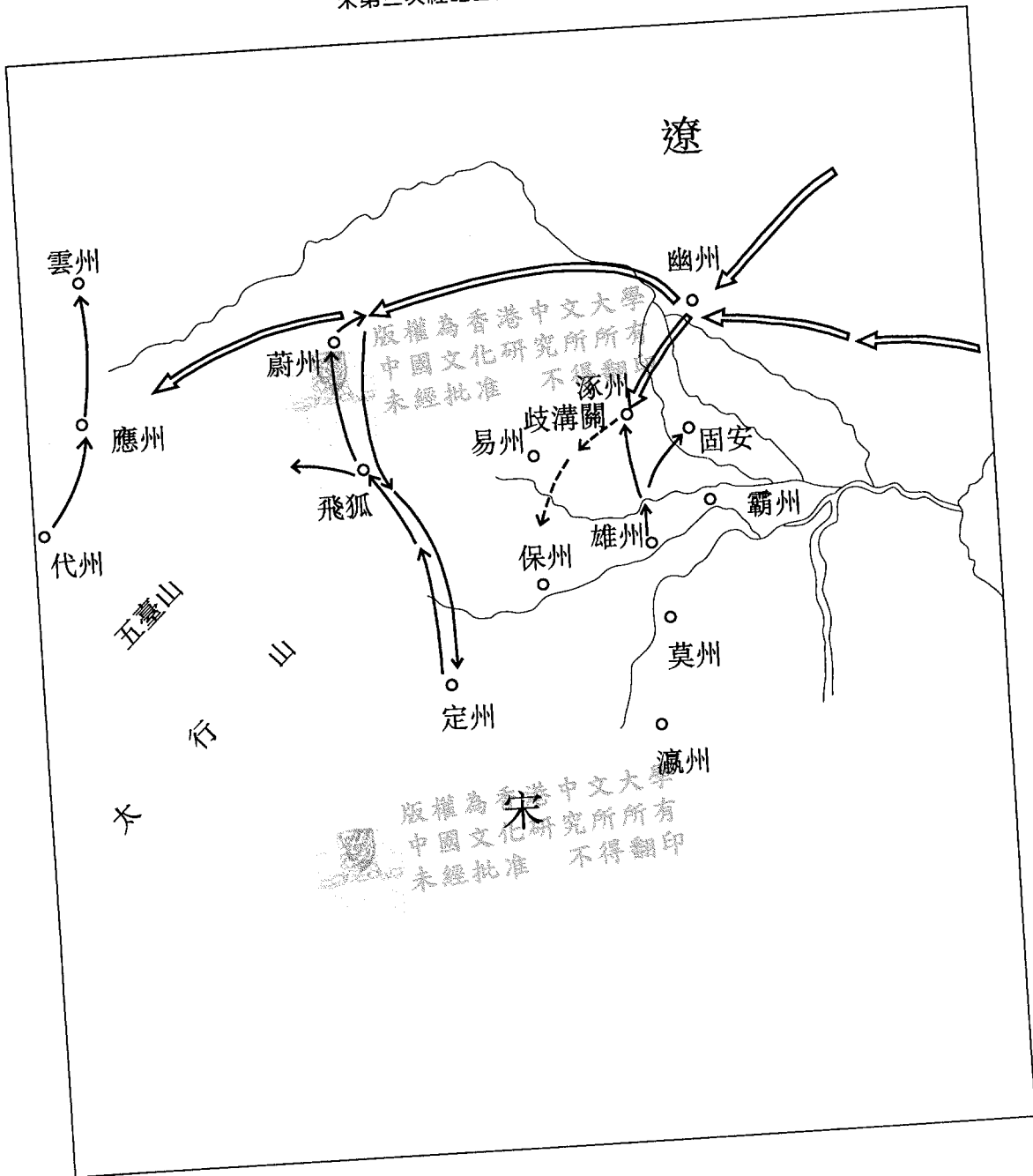
北宋第二次經略幽燕作為戰略失誤的例子，揭示出不同大戰略取向之間的妥協和遷就，雖然在政治上極為常見，但卻提高了軍事決策的風險，加深了大戰略與戰役層次的脫節。宋代並非不重視謀略，但仍然常常遭受軍事挫敗，除了實力有限之外，戰略各層次的脫節也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戰略脫節：宋太宗第二次經略幽燕(986)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宋第二次經略幽燕作戰經過圖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Strategic Disjuncture: The Disastrous Failure of the Song Yuzhou Campaign (986 A.D.)

(A Summary)

Shui-lung Tsang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Song military misfortune in 986 A.D. by applying the pioneering theory of grand strategy and military strategy. The author identifies the asymmetric relations between pacification and reunification, two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the early Song (960–1127). The incompatible nature of the two objectives generated difficulties for the emperor and his servants to reach a necessary conscience in grand strategic agenda. As the undoing of the early Song pacifism discerned, the Second Emperor of the Song turned his focus on operational strategy, especially the technique to launch sudden attack. However, the Emperor's attempt to regain the Chinese territories ceded to the Khitans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became a failure. The catastrophic defeat of the Song Expeditionary Army at Qigou Guan caused the first military crisis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dynasty in its 267 years. Moreover, the Emperor suffered from losing more than thirty thousand well-trained Palace Guards. As a result, how to resist Khitan invasions became the core of an extensive debate on state defense.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disjuncture between grand strategy and operational strategy was an important cause of the Song military incompetenc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